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记忆

■ 周立波

巴金谈周立波

◆ 金振林

人过八旬,难免回顾一生。坎坷、辉煌并存,值得自豪的是三件事:我有个美满的家庭,子孙忠信孝悌,事业有成;1980年创办了儿童文学杂志《小溪流》,被诮为“小溪流”之父;不敢当;写了几十本文学著作,多次获全国大奖。我还有三件宝,不是名车、豪宅和巨款钞票,而是文坛巨匠茅盾的墨宝、巴金的手稿及赵丹临终前的绝唱“寿星图”。

那么,巴金的原稿怎么在我手中?上面写了什么?为何没有收入二十六卷《巴金全集》?说来话长。



■ 1956年1月周立波(右)同巴金(中)在前往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际,专程前往德国大文豪席勒的纪念碑凭吊

冒昧见巴金

巴金(1904年11月25日——2005年10月17日),本名李尧棠,四川成都人。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,继茅盾之后任中国作协主席。

我从小喜爱巴金的作品,对巴金崇拜如神。做梦都没想到,终于和他有了一面之交,半天情缘。

1964年,我被作家周立波调入湖南作家协会,屁股未坐稳,不久“文革”爆发,烽火连十年,我到五七干校待了五年,作家梦真的成了南柯一梦。

省文联分成保周派和斗周派,斗得不可开交。我是周立波、蒋牧良拍板调入文联的,自然成了保周派。当时,对于周立波的个人经历我却浑然无知,只读过他的作品。于是,便产生外调周立波、蒋牧良的念头。我去的第一站便是上海。

巴金在“文革”中早被“揪”出,打倒“黑老K”的标语铺天盖地。我能见到他吗?碰运气吧!

那是1967年重阳节,一个阴沉的秋日,下午,我持介绍信到了上海作协,工作人员便将巴金领到二楼过道口。三人呈品字形落座,巴金朝南面壁,我坐他的右边,工作人员坐在他下边。

巴金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浅蓝色中山装,脚下是一双旧的棕色皮鞋,他戴着一副眼镜,虽然经历了一年多的折磨,仍从容不迫,不卑不亢,满面慈祥。我从他右边看去,尤其那“文曲星”下巴颌儿特别尖长,头发有些花白,讲话时稍有口吃。他告诉我:“今年六十二岁”。

我说明来意,他便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立波谈起。

不愿出国的周立波

“三十年代,周立波在上海,我只知道他的名字,他翻译过肖洛霍夫的名作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。第一次接触还是在1956年1月,和周立波去柏林参加德国(东德)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。这次去民主德国,他不愿意去,是陈白尘打了几次电话把他找来的。他到京较晚,我已把发言稿写好了。他当时就说不愿出国,并说他在农村参加合作社建设工作,到合作社正式成立时,他却看不到,很有意见。”巴金回忆道。

那年,巴金52岁,周立波48岁,正当壮年。

“我们同德国驻中国大使同机到达柏林,下了飞机,却没人欢迎,那位德国大使也不管我们就走了,我们在机场等了一个钟头,人都走光了,后来机场工作人员也走了,有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外面院子里。周立波一直在抱怨,他说真不该来,我们马上回去!我反而得安慰他,后来大使馆文化参赞叶克来了,叶克是延安鲁艺的学生,周立波还是他的老师。叶克说,他得到国内动身的电报,估计我们不会到得这么快。后来得到商务处电话,临时找汽车司机,当天是星期六,司机上街去了,因此,等了许久,才到机场来。叶克把我们接到使馆,便通知德国作协,不久,德国作协派作家来欢迎,把我们接到使馆去。这是周立波第一次发牢骚。”巴金继续说道。

巴金的记忆力非常好,接着又向我叙述了周立波第二次发牢骚。



■ 1973年10月16日,周立波结束监禁生活后的第一个周日,全家同游烈士公园

“这次开会,德国作协派给我们的中文翻译员不太负责,会场上人们发言,他只偶尔译出两三句,使我们感到莫名其妙。周立波坐在那里更不能安心。有一次德国作协请各国来宾吃晚餐,白天没有会。那天叶克约我们去使馆,说是朱(德)老总 and 聂(荣臻)老总要到使馆去接见使馆人员。我们那个翻译员同意晚上到使馆,去接我们同赴宴会。使馆曾(涛)大使请两位老总吃饭,拉我们作陪,但吃到一半,叶克通知我们,翻译员坐车来接我们去作协。周立波不想走,我问叶克怎么办?叶克还是主张我们两人都去。我便向曾大使和朱老总讲明情况告辞走了。周立波很不高兴,但还是一同去德国作协赴宴。宴会结束回到使馆,周立波一直说,今天不该离开使馆,对朱老总不礼貌。我说,我们是德国作协的客人,德国作协招待我们,不能不去,不去显得不友好。周立波反驳道,难道德国作协可以跟我们的朱老总相比吗?火气大得很,我们说了一阵就说不下去了。”

这大概是周立波第二次发牢骚,而第三次简直是发脾气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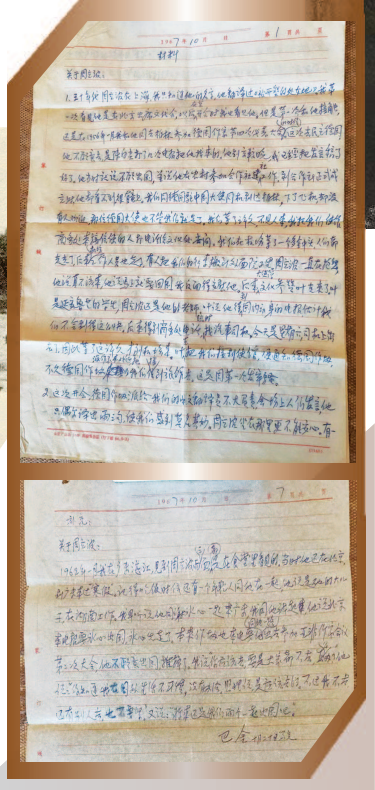
巴金说:“我们离开柏林回国,德国作协送我们上飞机,送客的人都走了,飞机快起飞了,叶克还不见来。周立波在飞机上大发牢骚,说他从此完蛋了,真不该到德国来。”问起来才知道,他这次出来组织关系也转到我驻德国使馆,他以为叶克今天会到机场送回给他,所以昨天到使馆去没有向叶克要回团员关系的信。失去党员关系,这对一位老共产党员来说,可是关系政治生命的大事,所以周立波连呼‘我完蛋了’。正在抱怨间,叶克终于在飞机起飞前赶到了,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”

听到此,我们似乎也松了一口气。

1964年,我调到湖南省作家协会后,跟周立波接触不多,他在家乡益阳清溪乡深入生活,机关里的事都交给文联副主席蒋燕处理,每月三百二十元工资让文联管财务的人贪污了也浑然不知,只是蒋老太常敲他的竹杠,要他拿出一个月的工资给机关改善生活,拿着钱让机关单身小伙子买自行车,周立波把金钱看得十分淡薄。

巴金说:“那次到德国,叶克交给周立波四千马克(约合人民币三千多元),说是德国出版社送来的《暴风骤雨》德文版的稿费,记得他自己拿了一千马克,又送我五百马克,其余都交了党费。德国作协也送了零用钱给我们,但是我们两次献花就花光

巴金手稿局部



了——一次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给台尔曼献花圈;另一次是在魏玛歌德像前献花圈,都是周立波的意思。在那里,冬天鲜花很贵”。

巴金又说,在他们离开柏林前一夜,曾大使要他回国后写访问德国的文章,周立波断然拒绝,说:“回去马上到湖南乡下深入生活,对德国一点也不了解,写不出访问的文章,曾大使听了颇不满意。”回到北京,过一两天他就回湖南去了,给中国作协的报告也是巴金写的,访问记一篇未写。

本来,会后还要安排访问两个星期,可是周立波归心似箭,一天也待不下去了,最后,退而求其次,巴金同意访问一星期,周立波这才勉强同意。

永世难忘的高风亮节

我插话说:“他心心念念着的是那本即将诞生的长篇巨作《山乡巨变》吧?”

巴金说,1962年1月在广东湛江又和周立波见面了,他说,中国作协要他和冰心一路去参加亚非作家第二次大会,他不愿去,推掉了。巴金说:“你应该去,要是大家都不去,怎么办?”周立波说:“你知道我在国外生活不习惯,没有办法。照理说,是该去的,不过,我不去,还有别人去,也不要紧。”又说:“将来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国吧”。

巴金归结说:“我的印象周立波对国际斗争不感兴趣。”

我和巴金笑谈风生,陪在旁边的那位工作人员,对我们的谈话似乎不感兴趣,便起身,落座,不时地楼上楼下走动。谈得开心时,我见巴金十分得意地跷起二郎腿,搁在左腿上的右腿脚尖,还习惯性地抖动起来。工作人员很不高兴地呵斥道:“把脚放下去!”

巴金乖乖地收敛了笑容,正襟危坐地跟我谈起了我的恩师,他准确地刻画了蒋牧良。

“蒋牧良的话,只有一两句我记得清楚,他抗战前有一次在杂志社请客时告诉我,蛇肉是最好吃的,吃过蛇肉,什么菜都没有味道了。根据我过去的印象,他是个

倔强、老实、感觉不太灵敏的人。”

至于时任文联副主席的蒋燕,原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和对外文协工作,后来调到湖南。巴金说:“有时文协要我参加外事活动,蒋燕也给我打过电话,见面她很客气,谈话也很亲切,因此,我对她也有好感……”

我和巴金交谈了三个多小时,既不像“外调”又不是采访,临别时,我提出请巴金把今天的谈话写成文字,他满口答应:“好的!”

“外调”巴金后,我顺道回南通老家住了几天,回到长沙春华路四号文联大院,便收到上海作协用挂号寄来的浅黄色信件。这是巴金写于1967年10月20日的七页材料,大约三千多字,在横格材料纸上,娟秀的钢笔字,似乎一气呵成,没有涂改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,既没有在开头写上毛主席的语录,末尾也不见一个“万岁”的口号,质朴得如巴金其人。

那次长谈,因系“外调”,工作人员没有把介绍信给巴金看,巴金自然不知我姓甚名谁;在他们的监视下,我想跟这位崇敬如神的文学巨匠握个手,道声谢,都不可能。然而,巴金先生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,不在老朋友脸上抹黑,实事求是,说真话,讲实情,其高风亮节让我永世难忘!

时隔56年,巴金的七页手稿一直在我身边,也许若干年后,我的子孙也会把手稿原件捐献给巴金的《佚文集》呢!

我与周立波最后一面

1978年12月,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,我在北京开会,听说周立波病了,而且是绝症,我便抽空去301医院南小楼去看望他。

我告诉他,《文学评论》刚在华侨饭店召开会议,为一些作家作品平反的事。“你的《山乡巨变》也是其中之一。”

周立波未戴眼镜,他穿件棉衣,在屋里慢慢地走着,本来很平静,一听说《山乡巨变》平反了,立刻激动地问我:“湖南给我平反了吗?”他很关心湖南文艺界的情况,有很多话对我说。

探望的时间早已过去,我真不忍离去,临别时,他痛苦地说:“‘文化大革命’耽搁我两部长篇小说,今后我不能多写了。”

听到这儿,我难过得要流泪,还有什么比一位作家不能写作更痛苦呢?

周立波病情,使我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,泪花终于不听使唤地糊满双目,而周立波却坦然地善良地微笑道:“明年春上,我们一起开会啊,一起开会!”

他和夫人林蓝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,轻轻地挥动着那双写出巨著《暴风骤雨》《山乡巨变》的瘦削的大手,这双为文学画廊创造了许许多多难忘形象的巨手!

多少年过去了,巴金的七页手稿写于1967年10月20日,再过几天就满56年了。

巴金仙逝于2005年10月17日,今年10月17日是他逝世十八年忌日,巴金是位百岁老人。而我的恩师周立波(1908年8月9日—1979年9月25日)一生多舛,只活了71岁,天不永其年。

本版图片提供/徐玉豪(周立波儿媳)